

10. 《台灣文化》6卷1期，民國39年。

11. 〈簡史〉著者以及宮本延人先生均以1897年圓山貝塚的發現為台灣先史學研究的端緒，但，事實上台灣先史學的開始是在前一年，於芝山巖發現石器時起頭的。參看宋文薰〈湮滅中的台北史前遺址（一）〉《台灣風土》147期，民國40年。

12. 同1。

## 鳥居龍藏博士與台灣

宋文薰 原著 黃智慧 譯

《鳥居龍藏全集》（以下簡稱《全集》）共12卷、別卷1卷（朝日新聞社1975-1977）以及《東京大學總合研究資料館所藏鳥居龍藏博士攝影寫真資料目錄》（以下簡稱《目錄》）共4冊（東京大學總合研究資料館1990）的出版，是一件驚動日本學術界的大事。如在本解說書〔譯註：指《德島的先知——鳥居龍藏眼中的亞洲》，德島縣立博物館1993〕的序言，也就是龜井節夫館長所寫的「致詞」裏所提到的，為了紀念後者的完成，首先，東大總合研究資料館為此舉行了特展，緊接著國立民族學博物館也推出了包括鳥居博士的收藏品在內的企劃展。隨著這些展出，各個機構也同時出版了很精彩的解說書；例如：《感光玻璃板上的世界——鳥居龍藏眼中的亞洲》（以下簡稱《感光板》）（東京大學總合研究資料館1991）以及《民族學的先知——鳥居龍藏眼中的亞洲》（以下簡稱《先知》）（國立民族學博物館1993）。這些書的出版不僅是學術界，更受到一般大眾的矚目。在這些特展裏，鳥居博士所拍的照片是展示的重點。根據《感光板》一書（38頁）的記載，「鳥居龍藏所拍攝的1895張感光玻璃板底片中，與台灣有關的竟達834張之多，約占總數的45%，是數量最多的」。在《先知》書中（71-72頁）也詳記從東京大學移到國立民族學博物館保管的一批，確定是鳥居博士所蒐集的372件標本資料之中，有關台灣的資料就占了94件，也是各個地區的標本資料中數量最多的。也因此，《目錄》全4冊之中，最厚重的第2冊與第3冊皆是關於台灣的資料。在第1冊裏，土田滋、姬野翠、末成道男、笠原政治四位教授將〈鳥居龍藏台灣調查〉作了概要的介紹。在《感光板》一書裏，則載有國分直一教授的〈鳥居龍藏博士與平埔族〉、金子Erika博士的〈鳥居龍藏與台灣的考古學〉（以下簡稱〈金子文〉）、姬野翠教授的〈鳥居龍藏台灣調查之民族學意義〉等諸文。在《先知》一書裏，松澤員子教授的〈鳥居龍藏的台灣調查〉一文，詳述了博士對台灣原住民的調查。此外，關於鳥居博士在台灣的體質人類學方面的調查，鈴木尚教授曾在《全集》第11卷的〈解題〉裏，有所說明。以上的每一篇論文皆出於人類學各領域權威學者精心之作。最後再加上鳥居博士的自傳《一個老學徒的手記》（以下簡稱《手記》）（朝日新聞社1953，轉載於《全集》第12卷）中，以〈台灣調查時代〉為題的長篇回憶錄。

拜讀了這些文章後，不禁想起當年，太平洋戰爭剛結束後不久，我在一本使用黃舊粗糙的紙張印製的雜誌上，寫了一篇名為〈鳥居龍藏與台灣〉（刊載於《台灣風物》第2卷第2、3期，1952，以下稱〈拙文〉）的小文章的事。那是四十二年前的事。當時的台灣新聞界對中國大陸與日本的消息仍封鎖得極嚴，可是竟然在1951年12月某一天不約而同地報導了81歲的鳥居龍藏博士結束在燕京大學的研究生涯，從北京回

到了日本的消息。由報界對鳥居博士的報導可以看出，在當時，連中共都對這一位研究中國文化的世界權威給予極優厚的禮遇，但卻顯得似乎與台灣毫無關連一般。當時台灣的人類學各個領域的研究，仍處在戰後的黎明時期，我深深地感覺到，有責任將開拓這些領域的鳥居龍藏博士介紹給台灣的人們。所以，我的那篇文章雖然只是一篇幼稚的作文，不過尚令人感到欣慰的是，文中至少述及了博士所有四次來台灣的調查，而且沒有犯什麼大錯。《台灣風物》是迄今在台灣研究的眾多民間刊物中歷久彌堅的雜誌。當年因為只是一本薄薄的讀物，所以，儘管拙文篇幅頗短，仍被主編把本文與參考文獻分開為二期刊載；參考文獻的部分另被題為〈鳥居龍藏有關台灣著作目錄〉（第2卷第3期1952）在下一期刊出。而我作夢也想不到的是，本文部分，被鳥居幸子女士翻譯成日文，保留原來的〈鳥居龍藏與台灣〉標題，收錄在鳥居博士所寫的《手記》的附錄裏。

去年(1992)，從北京到石家莊的火車上，很巧合地我與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學研究所的安志敏教授同座。雖是初次見面，我們却一見如故。除了我們有同齡之誼以外，鳥居龍藏先生是我們共同的話題。在談話中，我才得知安教授之所以能成為精通日語的優秀考古學者，乃是受到鳥居博士晚年薰陶的緣故。安志敏曾在以〈懷念鳥居龍藏先生〉（德島縣埋藏文化中心1992）為題的演講記錄中提到，由於鳥居先生晚年身居北京，與安教授同輩的日本考古學者們因此較無機會接近鳥居先生；再年輕的一輩，對於先生的記憶當然也就更加模糊了。這使我想起在《全集》第10卷的〈解題〉裏有如下描述：「當我提起筆來想寫一些東西的時候，……感到最大的困難是，我從不曾見過博士本人。……也就無法描述博士這個人活生生的像貌」（656頁）。這是日本考古學界長老樋口隆康教授所說的一段話。如此說來，我與鳥居先生並無面識，也是想當然的事了。我在寫〈鳥居龍藏與我〉（《考古學Journal》第199號1982）這一篇文章時，所說的我與博士的關係，實在是有點牽強的。但是，當我在1960年，在東京神田的舊書店裏發現博士的《手記》，並看到其中竟然收錄有〈拙文〉的那一剎那，我「不僅是感覺到光榮，更使我臉紅」（〈鳥居龍藏與我〉16頁），却是真實的。我猜想〈拙文〉之所以只被登載了本文部分，可能是因為先生的過逝吧，所以後半的參考文獻才會被遺漏。從《目錄》第一冊的28頁至30頁與《感光板》的234頁至236頁中所載與台灣有關的主要著書、論文的目錄看來，似是很難能期待有完整的書目。例如在《德島日日新聞》及《太陽》所發表的重要論文，確實在台灣是無法查得到的；而我連再引也包含在內所做成的目錄，之所以要比其他目錄在數量上略多，乃是因為博士所刊登在如《蕃情研究會誌》等其他數種多半在台灣發行的雜誌上的文章，是連《全集》都沒有收錄到的緣故吧。

至於我所專攻的考古學，已有上述的〈金子文〉論及，不太須要再加以補充。只是，在〈拙文〉中我曾強調有關博士的台灣考古學的業績，已在金關丈夫、國分直一兩位教授的〈台灣考古學研究簡史〉（1979年版的以下稱〈簡史〉）（《台灣文化》

第6卷第1期1950：《台灣考古誌》法政大學出版局1979）中有詳細的記述。金關、國分兩位教授把台灣先史學研究的經過分成三期來討論，第一期認為是「環繞著圓山貝塚而展開來」，我當時頗大膽地提議應改為「環繞著鳥居龍藏而展開來」較為恰當（〈拙文〉8頁）。在那段期間博士「走遍全島，發現並調查了許多重要的史前時代遺址」（〈金子文〉24頁），其中最令人驚異的是，在《目錄》第二冊中的圖版139與140的二張相片。這二幀照片的攝影年代雖然不清楚，但是頗有可能是1896年拍攝的。不過，關於上引該書兩圖版說明文指出，這是「卑南的巨石文化遺址」的這一注解，可能連博士自己也會有所異議的。如在本文最後所提的，這個遺址並不是屬於博士在其後三十年的1926年所倡言「台灣的巨石文化」系統的遺址。鳥居博士所謂的台灣巨石文化是指他從與森丑之助的通信中所得知，以現在的花蓮縣新社以及台東縣白守蓮等地所見的石造物所代表的文化而言（〈關於台灣古代的石造遺物〉《全集》第11卷：399~403頁），目前台灣的考古學界稱其為麒麟文化系統。而這一遺址是屬於金子博士所謂具有「石板棺（組合式箱型石棺）要素叢」（〈金子文〉25頁）的卑南文化系統的遺址。1945年金關丈夫、國分直一兩位教授曾經發掘過這一遺址（〈台灣東海岸卑南遺跡發掘報告〉《台灣考古誌》法政大學出版局1979），從1980年開始則因鐵路工程而進行了費時頗久的緊急發掘工作。因其屬於「世界級的遺址」（〈金子文〉25頁），故被指定為一級古蹟，並將設立成為台灣的第一座國立史前文化博物館。而一直到《目錄》出版之前，沒有人知道，鳥居博士這麼早就已拍攝過象徵這個遺址的立石的相片！

此外，我要順道一提的是，《目錄》第3冊圖版129的解說文也有錯誤。右邊的女性手持的農具既不是石器，也不是「石斧」（《感光板》75頁），和圖版140（《感光板》77頁）的照片中央的少女所拿的，同樣都是鐵製的頭部加上短柄的小鋤頭。如果真是耕作用的石器應該逃不過博士的慧眼才對。這些看起來雖然都只是很瑣碎的事項，但是在考古學上却是重要的問題。至少在有關台灣部分，我很能理解製作照片解說文的先生們不辭勞苦地盡了最為完善的努力，在此只是斗膽指出一點點瑕疵而已。

最後，我還必須提到上述諸文中都沒提到的，博士在台灣留下的另一項偉業。那就是被宮本延人教授稱讚為「不朽的大作」的臨時台灣舊慣調查會所刊行的《台灣蕃族志》1卷(1917)及《台灣蕃族圖譜》全2卷(1915)（註）的著者森丑之助（即森柄次郎，有時也自稱丙牛）。他是鳥居博士所精心調教出來的弟子。有了他作為繼承人之後，鳥居博士離開了台灣。宮本教授認為，在鳥居博士之後，「森丑之助在蕃界所做的實地調查留下了獨步古今的業績……，他所蒐集的原住民標本非常的多，是舊台灣總督府博物館〔譯註：現省立博物館〕的原住民標本中最重要及核心的部分，……大正末年，他在中國東海像謎般地消失（以跳水自殺之說最有力——筆者），台灣原住民研究者中無人可出其右」（〈台灣民族學研究史概說〉《民族學研究》第18卷1-2

號1954:82-83頁)。此外，有趣的是，對於鳥居博士的功勞評估，以曾經「做了馬淵不應有的發言」而被批評過（《感光板》14頁）的馬淵東一教授，却給予森氏極高的評價而說道：「或許森氏奔放不羈的性格和台灣的官場風氣會有無法相容的地方」（〈關於高砂族的社會人類學〉《馬淵東一著作集》第1卷1974:451頁）。

在《手記》中，鳥居博士曾寫道：「第四次調查時，森丑之助為助手相偕同行」（64頁），在〈台灣中央山脈橫斷〉（《全集》第11卷：431-459頁）的這篇文章裏，也隨處提到森氏的名字，他說森氏是「為了我，無論要去那裏都會使我完成任務的人……為了我，他說連生命都願意奉獻」（同上443頁）。森丑之助在〈生蕃行脚〉（以下簡稱〈行脚〉）（《台灣時報》第55、56、57、59、62號1942）中，也寫下了「第四次調查時，我自動地成為鳥居先生的忠實助手，作了地理的嚮導及土語（指台灣話）與蕃語（指原住民語）的翻譯，甚至補充調查等諸事。這對我而言，是為了能受到實地的學問上的指導，……所以我希望盡可能地貢獻己力協助鳥居先生完成工作……」的相當長的一段話（〈行脚〉一：107頁）。接著雖然他說「我不是很喜歡敘述過去」，可是對於25年前他做博士的助手時的調查情境，「循溯著往日的記憶，我試著寫下，25年前兩個勇敢的少年（博士30歲、森24歲——筆者）所進行的生蕃國度的巡禮，如同日本歷史故事中彌次與喜多兩人的旅途一樣（譯註：有說有笑，彼此照應）」（同上108頁），他用丙午生的筆名分五回連載了這段令人回味無窮的長篇回憶文。森氏所寫的〈行脚〉也是唯一可以補填《目錄》第一冊（24頁）〈台灣調查旅程〉中，博士在1900年1月和2月那段空白期間的資料。森氏在這篇充滿感傷的文章裏，以好像是說給「鳥居先生」聽的語調來寫成。在第一回結尾的段落裏，他寫道：「路旁的桃花、李花，紅白相間的野生日日草也正盛開。從台灣海峽吹過來的風似乎帶著春天的氣息。……一切都準備就緒了。鳥居先生，上路吧！我們回水底菘去！」（同上114頁）。

如金關與國分兩教授所指出，博士「離開研究台灣先史時代的舞台」，是在「鳥居博士以介紹森丑之助氏書信的方式，向學術界發表關於台灣巨石文化的首篇報告之後」（〈簡史〉9頁）。依據鳥居博士的記錄，那封書信正是森氏像謎一樣死去的1926年所寫的，這或許就是森氏最後的絕筆，也說不定。

（本文原載《德島の生んだ先覺者——鳥居龍藏の見たアジア》，德島縣立博物館1993。）

#### 【附註】

森丑之助的這一套圖譜，包括了自鳥居博士最後一次離開台灣後的第二年（即1901年）起，到1915年期間所拍攝的台灣原住民族的照片。這兩卷共計200頁的圖版，附有非常仔細的解說。從森氏的攝影手法等可以很清楚地看出，這是博士所傳授的衣鉢。

## 鳥居龍藏的生涯

黃智慧

我從未倚靠學校的畢業證書或身份頭銜來討生活。我塑模了我自己，我這個人也只有靠自己。我日夜苦心地要鍊就我自己。我靠自己而活，我的偶像也就是我自己。我的學問是我自己的學問，伴隨著我的是妻子及孩子們。……聖人嘗說：「朝聞道，夕死可也」，我不是一個道學家，可是我最愛這句話的精神，作為一個在野民間的學者，我甘之如飴。

——《鳥居龍藏全集》vol.12:341

（一）德島的自修少年 1870年（明治3年）4月4日，在一個江戶幕府與明治新國家更替交迭，社會急遽變動的時代背景下，鳥居龍藏誕生於日本四國德島市中心的新町川河畔，一個富裕的煙草商人的家中。

鳥居家數代以來皆負責阿波國（即今日德島縣）藩主家的煙草供應，是當地首屈一指的煙草大盤商。這個事業在他的外祖父新助（第五代）的時候達到鼎盛，家中雇用了眾多長工與夥計。但是新助的妻子早逝，只留下一個女兒名叫toku，成年後新助替她招入夫婿，生下一子叫友太郎。後來新助與入贅的女婿不合，令其離緣，才又在德島市附近以產藍染料有名的榎瀨村招入中川岩吉為婿，並改名新次郎，讓他承襲鳥居家業，成為第六代家長。新次郎與toku之間久無子嗣，據說是toku誠心向地藏菩薩祈禱後，終獲一子，遂取佛教中的尊名，曰龍藏。

鳥居龍藏出生以前，祖父新助業已過世。長他十來歲的友太郎，又因罹患腦膜炎導致智能不足，所以，龍藏可以說在全家殷切期盼中來到世上。他的幼年時代，受到父母及全家上下夥計女侍加倍的寵愛，日子在無憂無慮、自由放任的氣氛中渡過。在他晚年所寫的回憶錄《一個老學徒的手記》（以下簡稱《手記》）及其他隨筆裡，有多處非常細膩地描寫他的家庭帶給他的影響。

他的父母頭腦開明，對於當時流行的町人文化（註1）的種種嗜好皆有涉獵。尤其是母親醉心於戲曲觀賞，鳥居從小跟隨母親上戲院看人形劇與歌舞伎，對於歷史典故如數家珍，對劇中人物造型更是刻畫於心。他從五、六歲的時期起，就喜歡收集各種江戶繪、錦繪、歷史畫冊、玩具類（尤其鑲有人物相片者）等新奇稀有的東西。在這些人物繪或風景畫的收集過程中，家中長工們四處揀著他去收購，一面又能講解其中故事給他聽，是他最愉快的童年回憶。對於收集來的書物的整理，他自承受到母親的影響最大。他的母親整理東西非常細心，連鳥居小時候穿過的衣物、腰帶，乃至於畫過的一張圖繪等都收起來存放，沒有一樣紊亂或丟失，鳥居日後回想起，這便如同標本的收集與整理一般，似乎他從小就耳濡目染了。

然而，等到鳥居上了小學（現在的新町小學）以後，卻非常不能適應學校的管理與教育方式，經常從學校逃學回家。當時的士族子弟，多半因改藩而失去官祿，家境

遠流出版社台灣館編《跨越世紀的影像》1994年9月初版，21-32頁。